

浦东和浦东主义

陈汉楚

PULUDONGHUOPULUDONGZHUYI

江苏人民出版社

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

陈 汉 楚

—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

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

陈 汉 楚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25 字数 43,000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书号：3100·209 定价：0.17元

责任编辑 赵德水

前　　言

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生活在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的活动及其思想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同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持续近三十年的斗争，直到巴黎公社革命时期才将它埋入坟墓。

我们中国人对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并不陌生。由于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所以，早在20世纪初，他的思想就传入中国，并有着一定的市场，对中国革命也产生过影响。

应当肯定，蒲鲁东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他的见解大多来自他本人的体验和对社会的看法。他继西斯蒙第之后提出一整套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观点，试图由此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形态的政府、一切国家，主张个性“绝对自由”，否定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无疑，这些见解是荒谬的、反动的。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齐心协力地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澄清各种错误的经济思想，批判无政府主义乃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对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笔者编写了这本小册子，书中如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〇年一月

目 录

一、蒲鲁东的身世

- (一)家庭和青少年时代 (1)
- (二)以批判家的姿态投身于社会 (4)
- (三)政治舞台上的改良主义者 (11)

二、蒲鲁东的经济思想

- (一)蒲鲁东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20)
- (二)蒲鲁东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 (25)

三、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 (一)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观点 (35)
- (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是其经济自由思想的表现 (40)
- (三)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绝望心理的反映 (42)

四、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 (一)第一国际前期的蒲鲁东主义 (46)
- (二)巴黎公社和蒲鲁东主义的被埋葬 (53)
- (三)19世纪70年代蒲鲁东主义在德国的影响 (57)

附：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年表

一、蒲鲁东的身世

(一) 家庭和青少年时代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于1809年1月15日出生在法国东部贝藏松城郊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父亲是农民也是木桶匠，还曾经在家酿造啤酒。蒲鲁东很重视自己的农民出身，他曾在国民议会的一次发言中，向一位同他辩论的以出身显贵而自傲的贵族宣称：“我的十四代先人都是庄稼汉，请你给我那怕只举出一个有这样高尚先人的家族来。”后来，他在《自传》里也这样写道：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同时又是一个平凡的木桶匠，他有五个孩子，其中我年龄最大。十二岁以前，我的生活是在田野里度过的，有时作些轻微的农活，有时放牛。蒲鲁东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正是法国经济政治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产业革命在法国迅速兴起，资本主义有了显著的发展：铁路建设扩大了；蒸汽机开始大量采用，在19世纪初只有个别部门或个别企业可以见到蒸汽机，到了40年代末法国已经有了五千台蒸汽机；重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其中煤炭的开采量日益增加，在40年代末，煤炭产量已增加到约五百万吨，比1810年增加了约四倍。但是，尽管大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小手工业生产在当时法国工业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的情况也相类似。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小农经济处在破产的过程中，到60年代，法

国农村中被雇佣的农民数量已经达到九十万。另一方面，在农业中，小农仍占着优势。虽然，法国的广大农民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后曾得到了一小块份地，但是，由于政府繁重的捐税以及高利贷者和地主、富农的层层盘剥，他们又很快地陷入了贫困的境遇中。按照马克思的计算，当时法国每个农民家庭的收入，平均起来一年仅仅二十五个法郎。小农所处的困苦状况，使他们迫切要求改变本身的生活。

小生产者的不断破产，工人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促使工人运动不断地发展。从1825年起，几起大罢工席卷了法国各大工业中心。1831年和1834年两次里昂工人起义震撼了法国，使资产阶级惊慌失措。这种政治状况，使空想社会主义广泛地流行起来。由于法国小生产者的大量存在，所以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显得特别活跃，它们对法国的社会思想、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批评，然而不过是重复着他们先驱者的论调，依然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社会，力图维护小私有制。不同的是，他们只是试图以另一种形式达到维护小私有制的目的罢了。蒲鲁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蒲鲁东的父亲曾经打算开设一个木桶作坊，但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结果是负债累累，根本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甚至连自己的土地也卖掉了。就这样，他的家庭成了高利贷的牺牲品。蒲鲁东从小经历了这场灾难，在他年幼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高利贷的种子。他很惋惜自己家庭小私有经济地位的丧失。蒲鲁东十二岁那年，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到贝藏松城一家旅馆里当雇工。后来，在亲

友的帮助下，他又被送进一所中学去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大量神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书籍。但是，初中没有毕业又被迫中途辍学。随后又到一家专门承印神学方面书籍的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不久做了校对员。蒲鲁东是一个勤于自学的人，他利用机会，阅读了大量神学、语言学等方面 的书籍，获得了非常广博的知识，并受到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1831年，蒲鲁东离开故乡，到法国各地一边工作，一边游历。这一年，里昂爆发了丝织工人的罢工，罢工又很快演变成起义，震动全国。他又亲眼看到在一些工商业城市中大资本家对小生产者的猛烈冲击，造成小生产者纷纷破产的景象。他为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悲惨命运感到不安。在旅途中，他还数次遭受到饥饿的威胁。在土伦，他找不到工作，难以糊口，不得不求告于市长，妄想得到政府一点施舍。结果搞得狼狈不堪，被驱逐出了土伦市。

无奈，蒲鲁东又回到家乡。他一方面同别人合伙经营印刷所，一方面致力于刻苦自学。他博览群书，不断地从所读的书本中积累知识。他读了很多书，但并不系统。他象一般小生产者那样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认为受到教育是摆脱贫困和求得出头之日的手段。他在谈到自己这一时期的生活时说：一想到我的地位低下，我就觉得害羞。起先我觉得贫穷就好象是受惩罚那样可耻，于是，我发奋地学习，发展智力，为的是侧身于幸福者的行列；因为，学术就是财富和资本。当我看到工人不能作到这一点时，我感到愤怒了。

当然，蒲鲁东的这种愤怒并不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愤怒；而是地位低下的小生产者企图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

位，从而达到占有财富，但又感到在现存条件下无法实现而终于产生的愤怒。必须指出，这决不是说蒲鲁东在赤裸裸地追逐个人名利，也不是说为了求得他个人发财致富。这在后来，即使他名望很高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做。蒲鲁东是为了他那个阶级。他只是反映了破产中的小生产者对周围现实所持的一种态度。

如前所述，蒲鲁东亲眼看到他父亲的小农经济遭到破产，眼看自己就要过半无产者的生活，但并不甘心。于是，他试图争得物质上的独立地位并成为一个小私有者，但未能成功。由于他的出身和地位的关系，促使他成了代表那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维护小私有者的地位，保护小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争取财富的平等分配，这就是青少年时代蒲鲁东的基本思想倾向。

（二）以批判家的姿态投身于社会

1837年蒲鲁东的第一本小册子《普通语法论》问世了。这是一部既是神学的、也是社会经济学的作品。蒲鲁东肯定地说，通过语言的研究可以确定人类的共同性以及所有各部族的起源。他力图证明在人类起源的时候就是人人平等的，平等原则是人类的共同性。可见，他一开始就是以批判现实社会的姿态来作劳动者的“保护者”的。

蒲鲁东曾把上述著作提交贝藏松大学以谋求奖学金。因为这时蒲鲁东的生活更加困难。他的小印刷所由于资金不足而被迫停业，并欠下了一笔债务。但是，贝藏松大学并没有立即批准给这位青年自学者以奖学金。这主要是因为他那对

平等原则的“论证”以及代表劳动者讲话的大胆言论所致。后来经过蒲鲁东长期的奔走和申请，终于获得了一笔为期三年、每年五百法郎的奖学金。这在蒲鲁东看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使他有可能献身于科学著述活动。他在寄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大家都祝贺我，他们看到，我现在能够平步青云，并且在得到荣誉和辉煌地位以后还能够比得上若夫鲁亚^①等人甚或超过他们。

然而，使蒲鲁东闻名的著作却是《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一般译为《什么是财产？》），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那句：“财产就是赃物”的名言。当时，蒲鲁东靠着那笔奖学金移居巴黎，住在塞纳河对岸布尔戈尼街一所简陋的住宅里，无生活来源，处境也十分困难，有时甚至想投河自杀。他就是在这种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极为困苦的境遇中写出了那部名著，博得了很大的名声。

在这部著作中，他用新鲜的文体对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当然是大私有制）的各种论据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人类在权利方面是生而平等的，人人有权享有自己劳动的产品。地主和资本家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扣留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这就侵犯了他们的这种权利，因而是一种盗窃行为。据此，他借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②的一句话对所有权

①若夫鲁亚（1772—1844），法国的动物学家，在关于物种起源的学说方面被认为是达尔文的前驱者。

②布里索·雅克·比埃尔（1754—1793），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革命初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后为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吉伦特派的领袖和理论家。他在《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盗窃》一书中曾说，“财产就是盗窃”。

下了一个定义：“所有权就是盗窃！”当然，这里所说的所有权指的只是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权，而不是泛指一切财产的所有权。他抨击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蒲鲁东作为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于小私有制是极力加以维护的。他认为，小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是一种“个人的占有”，而“个人的占有”是社会生活的条件，是一种权利，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而保留“占有”，就可以从地球上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祸害。这是极其天真的幻想。他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对共产主义制度也进行了歪曲和攻击。当时，虽然科学共产主义还没有诞生，但是从欧洲流行的一些先进思想家的论述来看，共产主义是消灭压迫和剥削及其产生的根源私有制，使人们都能愉快劳动，从而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蒲鲁东却说什么，共产制是“反对独立性和对称性”，“压制智力上和情感上的自发性、行动和思想的自由；……用相等的美好来酬报劳动和懒惰、才干和愚蠢、甚至邪恶和德行。”这纯粹是胡言乱语。蒲鲁东追求“第三种社会形式”，也就是要使一切人“平衡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对此，马克思在1865年给约·巴·施韦泽的信（即《论蒲鲁东》）指出，《什么是财产？》无疑是蒲鲁东最好的著作，但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历史中，这部书未必值得一提。因为蒲鲁东在这部书里，对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问题只是从一般权利观点来考察，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把财产关系就其现实形态作为生产关系总和来进行分析的，这样就不可能揭露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真正性质。同时，蒲鲁东在本书中已开始暴露出小资产阶级所固有

的一种矛盾：既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又维护其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所以，他“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①

蒲鲁东在巴黎期间，正值马克思于1843年10月底迁居巴黎。1844年约7月间，他结识了马克思，并且有过私人的交往。马克思同他进行过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马克思用科学共产主义启发蒲鲁东，希望他能够站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来，从事革命运动。但是蒲鲁东坚持小资产阶级立场，坚持小生产的观点，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使他们的关系破裂了。

1845年1月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是年2月，马克思迁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工人，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打算在伦敦、巴黎和德国成立通讯组织，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打下基础。5月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蒲鲁东邀请他参加通讯委员会并做法国巴黎小组的通讯员，以便能够“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②然而，蒲鲁东回信却傲慢地拒绝参加这一革命活动，并且攻击共产主义是“教条主义”，表示反对革命的方法。他说：我认为把批评性的或可怀疑的形式再保

^①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142页。

^②马克思：《致比·约·蒲鲁东（1846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页。

留一些时候是我的责任，也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我是公开主张经济上的几乎是绝对的反教条主义的。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根本不需要用革命的行动来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暴力。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这就充分暴露了蒲鲁东在保存现有制度下进行改良的思想。

为了替自己的改良主义制造理论根据，蒲鲁东于1846年写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作了反科学的解释，宣扬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矛盾地位和它的两面性，在蒲鲁东这本书中得到了鲜明的、集中的表现。对此，我们将在他的经济思想中作具体分析。

在《贫困的哲学》出版之前，蒲鲁东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详细地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并附有“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这样的话。由于这本书的内容极端反动，它的出版将给工人运动带来严重的损害，所以马克思同蒲鲁东毫不含糊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该书出版之后，马克思立即于1847年上半年写成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并且于7月初同时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这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揭露了蒲鲁东思想的反动实质，给《贫困的哲学》一书以致命的批判。这一批判使得蒲鲁东暴跳如雷。从此，也就永远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然而，促使蒲鲁东和马克思、恩格斯分道扬镳、彻底决

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对待魏特林和克利盖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①问题上所存在的根本分歧。1846年5月，由于蒲鲁东拒绝担任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法国通讯员，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也就放弃了通过蒲鲁东同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打算。但是，蒲鲁东的反动思潮严重地危害着法国的工人运动，而且还与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及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者等结合在一起，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欧洲的工人运动。如果说，魏特林和克利盖的世界观还有一部分是出于他们经济上的无知，盲目地跟着蒲鲁东跑。那么，蒲鲁东则与此相反，他以揭穿了政治经济学秘密的姿态出现，并以此向工人炫耀，人们如何能通过竞争用合作社和互助储金会把整个资本主义压倒。因此，批判蒲鲁东的观点，肃清他的影响是争取教育工人群众刻不容缓的事情。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来到巴黎，向《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员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并同蒲鲁东主义、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当时，巴黎政治生活沸腾，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二十六岁的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那种热情投入了这场斗争。他积极地参加工人的集会，和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流派论战。恩格斯特别强调必须进行暴力革命，并指出，只有从这个根本问题上才能了解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

^① “真正的社会主义”又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主要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的一种反动思潮，代表人物有赫斯、格律恩等。它们用仁爱和友情宣传冒充社会主义思想，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本质。斗争是激烈的，有一次连续辩论了三个夜晚。在论战中，恩格斯向工人指出，共产主义者的宗旨是：“（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①在斗争中，恩格斯反复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经过两次大会的辩论，以13票对2票，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上述三项原则，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就是这样，恩格斯同蒲鲁东及其思想影响针锋相对，他在几次大会上有力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接着，又签署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反克利盖的通告，给了蒲鲁东以沉重的打击。

大约在恩格斯参加的这些大会之后的一个月，蒲鲁东的主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在巴黎出版，以示对抗。马克思、恩格斯毫不含糊，予以反击。马克思在当时一封写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介绍了他反驳蒲鲁东的整个计划。1847年，恩格斯再次来到巴黎，着手建立和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他被选进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负责通讯工作，并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的委托为同盟起草名为《共产主义原理》的纲领草案。后来，马克思和他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巴黎前往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受大会委托起草了《共产党宣言》。而蒲鲁东却沿着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越滑越远。

蒲鲁东写了许多文章。一般地说，他的文章体裁新颖，

^①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

格调自然。但他的作品往往写得非常散，谁都不认为他是个条理明晰的著述家。从蒲鲁东所出版的书籍、论文以及记载他个人观察所得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当代事物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对那些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他大都采取相当轻视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这些人对人性一无所知。他也同样瞧不起所有那些建议把人类生活纳入严密组织或颂扬权威的人。他几乎看不起一切人，唯独他自己了不起。他几乎批判一切，就是他自己最正确。他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于社会的。

（三）政治舞台上的改良主义者

1848年，欧洲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法国，从巴黎到波尔多，从南特到里昂，人民群众奋起斗争，武装起义的浪潮汹涌澎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也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最好的检验。以蒲鲁东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场革命风暴面前吓破了胆。他们总是步步退缩，谋求妥协。他们所散布的那一套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在群众中起着涣散斗志的腐蚀作用。蒲鲁东为了诱骗工人群众背离火热的革命斗争，走经济改良的和平道路，在1848年发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提出建立“人民银行”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吹嘘只要实现这一计划，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祸害。为此，他亲自动手筹建“人民银行”，发行12,000张股票（每张票面值5法郎），号召工人和小生产者购买这些股票。但是，这个银行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就在1849年4月

被迫宣布关闭了。

蒲鲁东从1848年欧洲革命开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根据他的改良主义理论，参与政治活动，提出了详尽的社会改革纲领。他走的道路始终是一条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他对革命是反对的。法国当时是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法国二月革命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先导。对这样一次有意义的革命斗争，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蒲鲁东不但不参与准备，而且根本就不主张这次革命。难怪马克思曾以讥讽的口吻指出：“二月革命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①革命的实践是对蒲鲁东改良主义理论的最好的批判。

特别要指出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一般都是反对采取革命行动的，但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坚决拥护民主的。而蒲鲁东不但反对革命斗争，不赞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也并不赞成民主。第一，他虽然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应当从社会的经济改造中寻求办法，但是却走的是改良主义道路，而且认为国家结构的形式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第二，他认为无论是共产主义或民主政治都会使自由和个性消失，而形成普遍的均等化。所以，他攻击民主制，胡说“民主制不但不是最完善的政体，并且是对人民主权的否定，以及人民主权灭亡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象以往推翻君主制那样地推翻民主制，这将是走向共和国途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自由不能和民主并立，就象不能和君主并立一

^①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